

《中西法律传统》

Legal Traditions of the West and China

2022年第4期(总第23期)

宋代民间争讼“无日无之”的表象与实质^{*}

洪 洋

摘 要 | “唐宋社会变革”序幕的开启为宋代“无日无之”的民间争讼提供了兴盛的客观基础,《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见繁杂的田宅侵界、遗产继承、婚嫁钱债纷争成为了天水一朝基层社会的微观写照。在曾出仕为官的宋人的文集与笔记小说中,对争讼现象的刻画常与“无日无之”相对应,而《名公书判清明集》亦聚焦在官府社会治理的语境之中。基层官员们将个别地区的现象泛化为整个社会的普遍风习实则是由集法官、税官与一般行政官于一体的身份属性而产生的面对冗繁州县事务自然萌发的心力焦虑之紧张情绪所致,这只是民间争讼的表象,并非宋代地理志类文献中所申发的“民淳讼简”与“嚣讼好争”交错共生的民间争讼之实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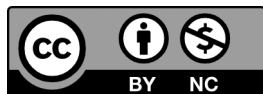
关键词 | 宋代;民间争讼;基层官府社会治理语境;区域地理与社会风俗场域

作者简介 | 洪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2021级博士研究生。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选题的缘起

在建立在义务本位之上并以无讼与息讼为主旋律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民间争讼被打上了扰乱法律秩序、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的烙印。争讼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社会现象,若以字形为依据可以发现,“公”“言”共同构成了“讼”,“攻乎不公者”是“讼”的原本之意,“凡有血气者,莫不有”“讼”的品性,正所谓“讼之始,义之激也,智之致也”;但是“讼”一旦与“争”联系在了一起并组建成“争讼”的话语体系,那么“讼”的“义之贼”“智之弊”“君子所深恶”^[1]等一系列话语缺憾便会接踵而至,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手执定分止争标杆的

基层官员们所欲竭力规制的对象。

宋代的民间争讼产生于“唐宋社会变革”的社会背景之中。自唐代宗大历年间开始,干戈频仍,赋税冗烦,秦汉以来少有变动的田制、户籍与赋役制度在积重难返的国家统治困境中出现了新的转变,其可视为“唐宋社会变革”的先导。至宋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2021年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徐谓礼文书整理与南宋公文运行规则研究”(2021BSCX01)的阶段性成果。

[1] [清]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一三一《原讼》,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17页。

代,蓬勃兴盛的商品经济、放任交易的土地政策、重利轻义的义利观念大放异彩,为民间争讼扩展了生存的空间:其一,封建商品经济的繁荣动摇了宗法等级制度赖以生存的根基,使愈来愈多的平等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前进步伐更加坚定;^[1]其二,宋代统治者审时度势地建立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在使土地快速流转的同时亦为田宅侵界提供了可能;其三,在商品经济与土地私有制的双重推动下,功利主义思想成功进入了打破纲常名教跻身于社会平等主体之列的下层民众之意识形态之中,其一反重义轻利的传统,甚至公然置血缘亲情关系于不顾径直掀起财产纷争,兄弟争、叔侄争、舅甥争、嫂叔争络绎不绝。在这一交争兴讼“三部曲”的推动下,“人户交易田地,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2]“此等词讼,州县之间,无日无之”^[3]“州县之间,顽民健讼,不顾三尺。稍不得志,以折角为耻,妄经翻诉……无时肯止”^[4]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郡邑之吏,朝夕奉行,莫非民事”^[5]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宋代民间的颇具声势的争讼风潮。

无论是在《宋史》《宋会要辑稿》等正史类文献还是在曾出仕为官的宋人的文集与笔记小说中,对争讼现象常用好讼、喜讼、健讼、嚣讼、终讼等来形容,一方面勾勒出了闾阎庶民私有财产观念的觉醒、诉讼能力提高的心性线条,另一方面则刻画出了文人士大夫阶层对民间争讼的摒弃与对无讼治道的追求。但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宋代乡土社会中

民间争讼的现实境况与基层官府植根于社会治理语境对民间争讼所作的“无日无之”评价是否相契合?或者说观念世界对现实世界所作的识别与反馈是否有所出入?现实世界对观念世界的渗入与磨合是否完整全面?如欲对该问题作出解答,不妨“探赜索隐”天水一朝地理类的典籍方志,“钩深致远”宋代茫茫史海,揭开笼罩在民间争讼之上表象与实质的神秘面纱。

二、基层官府社会治理语境中民间争讼的表象

“天子施政化德泽,自朝廷下四方,而止于县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后周致于其民也”^[6]，“郡守县令者，亲民之官……天下之治起于一县，县治则州治，州无不治则天下治矣”^[7]，“州县则近民之官也，而县最近。故民有休戚利病，县知之最悉”^[8]，宋人对州县基层官员体察民瘼治理社会之重要地位的评述可谓多矣，而使民间争讼消隐遁形进而维系乡土间里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则是与其重要地位相一致的使职担当。从此意义上说，作为延伸皇权下行渠径的“父母官”与“亲民官”，基层官员们对民间争讼拥有最直观的感触，能够揭示“无日无之”争讼现象的基本貌相。正是基于这一考量，笔者拟将聚焦的目光汇集到辑录南宋时期清正廉明的基层官员们所作判词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之上，以此为范本刻画出官府社会治理语境中的民间争讼风习。

（一）以田宅为标的物的民间纷争

宋代的物权制度以土地所有权作为其主要形式

[1]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五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三《营田杂录二》，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024页。

[3]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一人品门《弓手土军非军紧急事不应辄下乡骚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8页。

[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三》，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65页。

[5]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四三二《乞判定夺武县令罪名奏》，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页。

[6] [宋]蔡襄，[明]徐燉等编：《蔡襄集》卷二九《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阳序》，吴以宁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页。

[7] [宋]胡寅：《斐然集 崇正辩》斐然集卷一六《上皇帝万言书》，尹文汉校点，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321页。

[8] [清]宋世荣辑：《台州丛书乙集》赤城集卷三《临海县重建宣诏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与核心内容。“亩直浸贵，故多田讼”^[1]，土地的自由流通无不酝酿着以田宅为标的物的物权纷争、债权纷争等社会风险，《名公书判清明集》辑录的过半数涉及田宅讼案的判词即是最形象的印证。

1. 田宅物权纷争

其一，因所有权所致争讼。如在“高七一状诉陈庆占田”^[2]一案中，高七一以“诡名”与“无号数亩步……且无缝印”的伪造干照妄图侵占陈文昌的田产，其“谓自己所置田产，不应归并陈文昌户”的主张“显是欺诈”。另在“共帐园业不应典卖”^[3]一案中，梁氏兄弟三人的物业具已分析，但某处园地因系众业而未曾析产，梁淮之侄梁回老私自盗将此园地卖于龚承直，享有按份共有权的梁淮遂有词于官府。由此可见，无论是具有浓厚血缘关系的近亲属还是被挡在宗族血缘围墙之外的“异姓人”，无论是合法所有权受到侵犯还是意欲侵占他人的田宅，选择争讼、诉诸官府总是当事人争取权益的首要选项。其二，因典权所致争讼。终宋之世的法典《宋刑统》规定了典权设立的程序性要求，即“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4]。然而，植根于乡土社会之中真实的民间典卖活动已然与立法者通过强硬的国法规范交易行为的希冀相背离，“典卖田宅，多不问亲邻，不曾书契……是致不将契书诣官，致有争讼”^[5]或“妄称亲邻”兴讼的现象亦不在少数。

其三，因相邻权所致争讼。如在“田邻侵界以此见知曹帅送一削”^[6]一案中，聂家田地“被田邻张大宗、嗣宗兄弟侵占”，张氏兄弟亡故后其家人将所占田产尽数出卖，已历多年，而如今田邻车可言复行张氏兄弟之举，聂家无可奈何将其诉之官府。

2. 田宅债权纷争

作为债的产生形式，宋代田宅交易的契约制度已近成熟且形成了“交争田地，官凭契书”^[7]的契约准则，而这也为鬼蜮之人伪造契书侵田占产提供了证据法上的可能，其在“交易立契之时……或浓淡其墨迹，或异同其笔画，或隐匿其产数，或变易其土名，或漏落差舛其步亩四至”^[8]，由此引起的妄讼不可胜数。在交易契约所致的纷诉中，典卖契约与租赁契约最为典型，其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呈现。

其一，典卖契约所致田宅债权纷争。在宗法血缘关系依然坚不可摧的宋代，田宅对于乡民们来说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维护祖业、荫蔽家族的象征，除非如临家徒四壁的深渊、如履饥寒交迫的薄冰，否则即使生活再艰难也要争取在典卖期间届满之日前进行回赎。因此，因田宅典卖产生的债权纷争主要包括期满收赎时的地价分歧、以典卖为名行抵当之实以及妄称断卖契约为典卖契约申请回赎等类型。如在“曾沂诉陈增取典田未尽价钱”^[9]一案中，曾沂将田产典卖于胡元珪，后于典卖期限届满之日予以回赎，胡

[1] [元]脱脱：《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4页。

[2]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户婚门《高七一状诉陈庆占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3页。

[3]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共帐园业不应典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0-301页。

[4] [宋]窦仪等：《宋刑统》卷一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薛梅卿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5]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三六二《乞令果州典卖田宅将契书诣官陈首奏》，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313页。

[6]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户婚门《田邻侵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5-157页。

[7]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户婚门《王知之朱氏争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5页。

[8]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户婚门《物业垂尽卖人故作交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2页。

[9]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户婚门《游成讼游洪父抵当田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4页。

元珪遂低于原典价将田产转典于陈增，并在其名下倒租，曾沂便以陈增典田没有交足典价为由陈诉官府。另在“抵当不交业”^[1]一案中，徐子政典杨衍田已有二十六年，但在此期间徐子政未曾“收税供输”，杨衍也未曾“离业退佃”，二十六年后徐子政为了阻止杨衍（已逝薨）之子王廷回赎其父田以保证自己的租利，遂以其拖欠巨额租款为名有词于县。又在“已卖而不离业”^[2]一案中，寡妇阿章因穷困被迫将房宅断卖与徐麟，但依据法律规定“阿章固不当卖，徐麟亦不当买”，其后徐十二吝赎该房宅为己业，九年后阿章却诉称当初只是将房宅典卖给了徐麟，请求回赎原屋业。由典卖契约所引起的田宅债权纷争充分体现了民间社会的行为逻辑——或因不甘吃亏而强词夺理，或因唯利是图而指鹿为马，或因穷途末路而以假乱真，在行为逻辑的指引下，其深知使自己的主张成为现实的便捷路径是获得官府的认可与国法的强制性保障，向亲民化的“父母官”提起民事诉讼对其来说或是当然的精神慰藉。

其二，租赁契约所致田宅债权纷争。从《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不难发现，因赁屋而滋生的纷诉主要包括强行侵占所租房宅以及擅自修葺或毁坏所租房宅两类。如在“不肯还赁退屋”^[3]“占赁房花判”^[4]这一强占类案件中，“顽民中之至顽者”黄清道强行租赁贫儒陈成之的祖屋达十一年，不仅不交赁钱，

反而使索要赁钱的童仆饱受“欧伤之辱”，甚至以“业属妻家，欲赎回于典物”为由“讼主人而侵占地基”。另在“赁人屋而自起造”^[5]与“赁者析屋花判”^[6]两案中，承租人李茂森与李广均在“不待文约之立，不取主人之命”的情况下，擅自“撤旧造新”或“固当搬去自物，东壁打至西壁”，其行为俨然超越了租赁契约的边界，减损了出租人的预期利益，将正常的民间交易活动推向了争讼的边缘。

（二）遗产继承纷争

宋代的遗产继承是在宗法制度的伦理框架下进行的，财产继承仍以宗祧继承为先决条件。由于遗产继承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同气连枝的兄弟、关爱备至叔侄、荣辱与共的宗亲在迎面吹来的逐利之风撩拨下逐渐褪去了合睦族之谊、全兄弟之情、享伦常之乐的外衣，为了争夺锱铢之利，其往往会因“一朝之忿，或斗讼不已，或干戈相攻，至于破国灭家，为他人所有”^[7]，非但撕裂了基于宗法血缘而形成的亲属关系，更为本家之财被外家乃至他姓覬觐、本家之讼转变为两家之讼埋下了隐患。

1. 法定继承纷争

法定继承争讼的主体主要集中在家庭内部，具体可划分为亲子也即兄弟之间的纷争以及非直系血亲也即叔侄、亲子与义子、亲女与同宗兄弟之间所起的纷争等。如在“兄弟之争”^[8]“兄侵袭其弟”^[9]

[1]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户婚门《抵当不交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7-168页。

[2]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户婚门《已卖而不离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4-165页。

[3]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户婚门《不肯还赁退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5页。

[4]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户婚门《占赁房花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6页。

[5]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赁人屋而自起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4-335页。

[6]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户婚门《争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7页。

[7] 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宋元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96页。

[8]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〇人伦门《兄弟之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6-367页。

[9]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〇人伦门《兄侵袭其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3-374页。

等案件中,作为兄长的黄居易与丁璠“惟利之饕”,罔顾兄弟同气之大义,“颠冥错乱,灭绝天理”,“或挟长相凌,或逞强相向”,如此怎能不激起胞弟之反抗而有讼于官府?另在“兄弟之讼”^[1]“弟以恶名叱兄”^[2]等案件中,作为胞弟的邹应龙、丁细七为了蝇头小利竟“不念天显”“不恭于兄”,公然诉其兄长的行为“委是有伤风教”。同时,嫡庶兄弟之间的家产继承之争亦不容忽视,如在“持服张辐状诉弟张载张谔妄诉赡莹产业事”^[3]一案中,拥有“嫡长”“仕宦”“贤”之身份的张辐欲独占赡莹产业,在未经“庶幼”“白丁”“不贤”的两庶兄弟同意的前提下私自将其“舍以入院”,就差没有将庶兄弟污蔑为“异姓子”了。除此之外,以假冒亲子的遗腹子或别宅子归宗以骗取继承权、侵占家族财产而引起的争讼也不在少数,“辨明是非”^[4]“妄称遗腹以图归宗”^[5]“无证据”^[6]等案件均描绘了贪利小人“妄认归宗,占据产业”以致引发家族内部纷诉的图景。

叔侄之间争夺继承财产而兴讼是血缘关系冷淡化的集中映衬,其是宋代乡土社会中具有常态化与

普遍性的一类问题,发生的数量仅次于兄弟之间的财产争讼。^[7]《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见“叔侄争”多以未分析的共产继承为中心,如在“叔父谋吞并幼侄财产”^[8]一案中,李文孜幼年丧父,其叔父李细二十三非但将托孤之责抛却九霄云外,更“据其田业,毁其室庐”,如此“灭绝天理,亦甚矣”的恶行则能不引起李文孜的不满、不激起李文孜的讼意?而“阿李蔡安仁互诉卖田”^[9]“叔侄争”^[10]等案件则反映了侄子“影带包占”“欲行均分”叔父合法占有的共产之财之逐利行径,作为叔父的盛荣“兴连年之讼”就是纠纷结果最佳的印证。

亲子与义子、亲女与同宗兄弟以及围绕寡妻与赘婿的继承财产争讼也是宋代乡土社会民间生活的常态,但无论如何,义子、亲女、寡妻、赘婿的法定继承权利始终被其他族人所钳制,在法律赋予的有限权利空间内,如要真正行使自己的继承权,向公权力求助、开争讼之门对其来说或许是符合人之常情的明智之举。

2. 遗嘱继承纷争

宋代合法有效的遗嘱形式是“经官印押,执出为照”^[11]的书面遗嘱,由于遗嘱直接关系到法定

[1]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〇人伦门《兄弟之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1-372页。

[2]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〇人伦门《弟以恶名叱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2页。

[3] 《名公书判清明集》附录三《持服张辐状诉弟张载张谔妄诉赡莹产业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20-621页。

[4]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户婚门《辨明是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9-241页。

[5]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户婚门《妄称遗腹以图归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1-242页。

[6]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户婚门《无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2-294页。

[7] 高楠:《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问题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张本顺:《宋代家产争讼及解纷》,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65-166页。

[8]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户婚门《叔父谋吞并幼侄财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5-287页。

[9]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户婚门《阿李蔡安仁互诉卖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4页。

[10]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户婚门《叔侄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8-190页。

[11]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户婚门《僧归俗承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9页。

继承人的权利，并且与立嗣往往交织在一起，所以其在私利所挖的墙脚面前总会一触即溃。如在“遗嘱与亲生女”^[1]“女合承分”^[2]“鼓诱寡妇盗卖夫家业”^[3]等案件中，面对“经官给据”的合法遗嘱，遗嘱继承人或利益相关人依然嚣讼不已。而在“侄假立叔契昏赖田业”^[4]“先立一子俟将来本宗有昭穆相当人双立”^[5]“假伪遗嘱以伐丧”^[6]等案件中，尊长也好卑幼也罢，其甘愿受“囚牙讼师之所鼓扇”，以伪造的遗嘱作为“骗胁之资”与“凿空诬赖”之凭据，假伪遗嘱掀起的争讼风潮已到如斯地步，不得不令人为之汗颜！

3. 户绝立嗣纷争

所谓“户绝”是指本户人家无男性继承人，因此需要通过立嗣来传承门户、延续香火。但户绝立嗣远非易事，诸女的继承权与遗产份额、立继与命继的遗产分配、立嗣后同居人的财产继承等难题始终是笼罩在其之上挥之不去的阴霾，相较于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户绝立嗣需要考虑的情形与利益关系更为复杂。^[7]如在“熊邦兄弟与阿甘互争财产”^[8]

一案中，因三弟户绝，二兄只为其子立嗣而缠讼到官府，“名虽为弟，志在得田”成为兄弟之争最形象的写照。另在“同宗争立”^[9]一案中，鹤翁垂涎叔父王文植物业已久，由于成为嗣子的企图落空，其遂“染指其间”“观衅俟隙于志道（王文植所立嗣子——笔者注）”并“竭力以奉承”，而其叔父“游其术，而不自知”，最终投鸣官府请求立鹤翁为嗣。立继完成之后，若嗣子破荡家产或难以侍养周亲尊长，相应的“遣嗣—归宗—重新立嗣”纷争又会浮出水面。如在“生前抱养外姓歿后难以摇动”^[10]“出继子不孝勒令归宗”^[11]等案件中，立嗣人或因嗣子被母氏族人错误引导以致未遵守敬事尊长之礼，或因嗣子有“擅卖耕牛，私佃田地”等不肖之举进而将其诉至官府并主张重新立嗣，诸如此类的立嗣继产之争可谓多矣！在上述争讼面前，立嗣人的美好憧憬只能被无限限缩，并最终在重利轻义的宗法血缘关系中逐渐黯淡，“不过愿其保全家业”^[12]的慨叹与无奈已足够慰藉其的殷切期盼。

[1]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户婚门《遗嘱与亲生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7-238页。

[2]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户婚门《女合承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0-291页。

[3]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鼓诱寡妇盗卖夫家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4-305页。

[4]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户婚门《侄假立叔契昏赖田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6-148页。

[5]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户婚门《先立一子俟将来本宗有昭穆相当人双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8页。

[6]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户婚门《假伪遗嘱以伐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9-290页。

[7] 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页。

[8]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户婚门《熊邦兄弟与阿甘互争财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0页。

[9]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户婚门《同宗争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9-211页。

[10]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户婚门《生前抱养外姓歿后难以摇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1-203页。

[11]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户婚门《出继子不孝勒令归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4-225页。

[12]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户婚门《治命不可动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9页。

(三) 婚嫁钱债纷争

婚嫁纷争主要表现为在违法婚姻、悔婚、离婚、“再嫁—争婚”等过程中相关权利主体所开展的一系列利益博弈。父母以及其他尊长的主婚权是延续不缀的宗法伦理观念的直接产物,更是婚姻合法有效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卑幼擅自与他人订婚之际尊长会通过诉讼的补救方式维护主婚权。如在“告奸而未有实迹各从轻断”^[1]一案中,冬娘在父亲去世后私自与仆人成婚,其姑母孟圆因极力反对此桩婚事而向官府告论;与此相反,若有尊长为其主婚,那么虽然女子多次婚配,其他族人也不能以“失节固甚”为由“专好论诉”,“嫂嫁小叔入状”^[2]一案即为典型。婚姻的合法形式业已具备,但男方或女方尊长出于种种原因而悔婚,另一方为了修复破裂的婚姻关系必然会选择诉诸公堂。如在“女家已回定帖而翻悔”^[3]一案中,订婚帖之内已言明“谢氏女子与刘教授宅宣教议亲”,谢家已收取刘家聘礼,但谢迪却以订婚帖系伪造公然悔婚,刘家无奈之下便有词于官府。在“妻以夫家贫而仝离”^[4]“诸订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5]“婚嫁皆违

条法”^[6]等案件中,婚配双方及其父母尊长或在离婚契约写就后因妄想复婚而争讼,或在无法定条件的前提下违反了“三年不成婚者听离之条”并在对方另行嫁娶的基础上因妄想成婚而争讼,或罔顾违法婚姻之实因妄想维系婚姻关系而争讼。最后,由于女方的尊长觊觎男方的聘礼,强取出嫁女归家再行出嫁进而产生争婚纠纷的情形也大有其在。如在“女已受定而复雇当责还其夫”^[7]“定夺争婚”^[8]“将已嫁之女背后再嫁”^[9]等案件中,姜一娘、吴重吴之女阿吴与吴庆乙之女阿吴均被迫服从于父亲之意而两嫁,“使人父子,夫妻散离而不得合”的复嫁行为必定会使婚姻双方当事人卷入争婚的浪潮之中。

其二,《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见的钱债纷争主要围绕在民间借贷周围,既包括普通的贷款纠纷,也包括信用贷款——以“库本钱”为中心的纠纷。如在“重叠交易合监契内钱归还”^[10]一案中,江伸在向丘三三借钱一百贯的同时又将田产“作一百贯足典契”卖给丘三三,由于之后其复与徐吉甫交易该田产,丘三三始向官府论诉,“假贷作经营,又多以命穷计拙而折阅”^[11]实乃纷争之根源。另

[1]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善恶门《告奸而未有实迹各从轻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1—442页。

[2]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嫂嫁小叔入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4—346页。

[3]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女家已回定帖而翻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6—348页。

[4]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妻以夫家贫而仝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5—346页。

[5]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诸订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9—351页。

[6]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婚嫁皆违条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2页。

[7]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女已受定而复雇当责还其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4页。

[8]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定夺争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8—349页。

[9]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将已嫁之女背后再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3页。

[10]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户婚门《重叠交易合监契内钱归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2—143页。

[11] [宋]袁采:《袁氏世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在“领库本钱人既贫斟酌监还”^[1]一案中，罗友诚向周子遵借钱从事质库经营活动，但借款期限届满“所偿仅息钱之半”，周家遂“出入官府”“欲究竟到底”。

《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辑录判词的地域分布范围主要是南宋的浙西路、浙东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西路、淮南东路，^[2]涵盖了南宋半数以上的地理空间，加之上述所列案件只是其的典型代表，从此意义上说，上述民间争讼的纷乱场景可以认定是宋代社会的总体样态。除此之外，在宋人的文集与笔记小说中亦可一探官府治理语境中的民风好讼现象。如京东西路颍州太和县“里俗险悍，喜构虚讼”^[3]，颍州汝阴县“讼诉之烦，亦倍他郡”^[4]；浙东路台州黄岩县“赋输之富，倍于旁邑，诉牒之夥，复绝浙地”^[5]，台州宁海县在宋徽宗宣和年间迎面吹来的奢习侈风之侵袭下，虽僻远小县“亦渐炽于争”^[6]；淮南西路寿州“素好多讼”^[7]，濠州钟

离县“讼牒纷委，不减内地”^[8]；荆湖南路“地远而多险，民悍而喜讼”^[9]，潭州长沙县民“喜讼难治”^[10]即是实证；荆湖北路鄂州“号难治”，“土沃民剽，杂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11]；江南东路歙州“俗喜讼，善持吏长短”^[12]；江南西路“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盖专门于此……又闻括之松阳有所谓业鬻社者，亦专以辨捷给利口为能”^[13]，本路虔州（赣州）“地远而民好讼”^[14]“近盐，多盗与讼”^[15]，吉州之“治讼”“世以为剧”^[16]，隆兴府（洪州）武宁县“民喜讼而易刑，为令者多严法以止之，犹不能胜”^[17]，分宁县人“勤生而蓄施，薄义而善争……长少族坐里闾，相讲语以法律，意向少戾，则相告讦。结党诈张，事关节以勤视听”^[18]；福建路风俗浇薄，“生子既多不举”，这为“杀己子至后世狱讼不已”埋下了隐患，为了延续家族香火，无后者只能“养他人子以为息”，由此亦使“异日族人或出嫁女争讼

[1]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领库本钱人既贫斟酌监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5-336页。

[2] 王志强：《〈名公书判清明集〉法律思想初探》，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3] [宋]文莹：《玉壶清话》卷四，杨立扬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页。

[4] [宋]苏辙：《栾城集》卷三〇《崔公度知颍州》，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41页。

[5] [清]宋世荣辑：《台州丛书乙集》赤城集卷四《黄岩知县续题名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6] [清]宋世荣辑：《台州丛书乙集》赤城集卷四《宁海县尹题名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7] [宋]苏舜钦：《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卷九《朝奉大夫尚书度支郎中充天章阁待制知陕州军府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上护军赐紫金鱼袋王公行状》，傅平襄、胡问陶校注，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640页。

[8] [宋]楼钥：《楼钥集》卷一一三《知钟离县姜君墓志铭》，顾大朋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2010年版，第1962页。

[9] [宋]苏辙：《栾城集》卷二九《张绶湖南提刑》，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19页。

[10] [宋]蔡襄，（明）徐勣等编：《蔡襄集》卷四〇《尚书礼部侍郎郑君墓志铭》，吴以宁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35页。

[11] [宋]楼钥：《楼钥集》卷九二《华文阁直学士奉政大夫致仕赠金紫光禄大夫陈公行状》，顾大朋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2010年版，第1634页。

[12] [宋]秦观：《淮海集笺注》卷三六《鲜于子骏行状》，徐培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6页。

[13] [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讼学业鬻社》，王根林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14] [宋]苏轼：《苏轼文集》下册《赵清献公神道碑》，顾之川校点，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244页。

[15] [宋]曾巩：《曾南丰全集》卷下《光禄少卿晁君墓志》，胡协寅校阅，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147页。

[16] [宋]李觏：《李觏集》卷二三《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王国轩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64页。

[17] [宋]蔡襄，（明）徐勣等编：《蔡襄集》卷三七《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润州刘君墓碣》，吴以宁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83页。

[18] [宋]曾巩：《曾南丰全集》卷上《分宁县云峰院记》，胡协寅校阅，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152页。

其财无虚日”^[1]的现象愈演愈烈,本路泉州、福州民人“凶悍喜鬻讼,虽遭刑责,而不畏耻”^[2],建州建安县更是“讼日数十百”^[3];广南东路韶州“居南方,虽小州,然狱讼最多,号难治”^[4];西川路嘉州虽然“远王都”,但“吏横而肆,讼谋纷委”^[5];峡路果州(潼川府路顺庆府)流溪县“俗器于讼”^[6];利、夔、成都府、潼川府这“西南”四路所辖州县不仅“边远俗陋,牒诉券约,用土俗书”,而且多“村落强暴,窃入妻女以逃,转移他所,安居自若”以致“其亲父母兄弟及初娶者所诉”的“卷伴”^[7]之讼。

从中不难发现,在宋代基层官员们看来,江南西路、福建路、荆湖南路是民间争讼的“重灾区”,甚至呈现出了阖境民风好讼的貌相,不仅风俗之卑劣、民情之涣散已然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而且江南西路以课业律法词讼为核心的讼学、以教习律法词讼为职业的讼师已如雨后春笋般遍地浮现,^[8]在这三路为官理政必然要饱受陈冗多杂的民讼之苦;以成都府路为代表的西南四路因远离王畿、夷獠杂居,民俗尚未完全开化,在意识形态层面维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礼法文化尚未完全渗入普及,故因蛮俗劣习引发的专门性争讼不可胜数;京东西路颍州、两浙东路台州、淮南西路寿州、江南东路歙州、广南东路韶州、西川路嘉州皆是本路民讼繁伙的核心地区,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上述几路亦是

民间争讼集中的地域映衬。

结合《名公书判清明集》、宋人的文集与笔记小说以及前述“此等词讼,州县之间,无日无之”“郡邑之吏,朝夕奉行,莫非民事”“州县之间,顽民健讼……无时肯止”的泛指,完全能够推导出宋代民风好讼在全国范围内皆是如此的结论,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视野中的“诉讼社会”^[9]之起点亦可向前追溯至宋代。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转换视角,可能会探明事物的另一重样貌,对此笔者将以《宋史·地理志》以及《方輿胜览》作为考察范本,从区域地理与社会风俗的场域之中对民间争讼作出新的解读。

三、区域地理与社会风俗场域中民间争讼的实质

(一)《宋史·地理志》:宋代社会风俗的整体概观

“《宋史·地理志》的叙述是元人对宋代各地民风的一个概观,抓住了特点和重点,但也失之笼统且不够全面”^[10],这一评价确实是中肯恰当。而无论如何,《宋史·地理志》总会为我们提供打开宋代诸路风气习俗大门的钥匙,便于我们对民间争讼的实质作出整体的认识。据《宋史·地理志一》载,“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至宋

[1] [宋]王得臣:《麈史》卷下《风俗》,俞宗宪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2] [宋]庄绰:《鸡肋编》卷中《泉福妇人轿子与广州波斯妇》,萧鲁阳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页。

[3] [宋]蔡襄,(明)徐勣等编:《蔡襄集》卷三七《光禄少卿方公神道碑》,吴以宁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71页。

[4] [宋]曾巩:《曾南丰全集》卷下《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铭志》,胡协寅校阅,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128页。

[5] [宋]王十朋,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卷二五《何提刑墓志铭》,王国轩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9页。

[6] [宋]魏了翁:《渠阳集》卷一七《果州流溪县令通直郎致仕宋君墓志铭》,张京华校点,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56页。

[7]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七《桂海虞衡志》,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第125页。

[8] 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9]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明末以降,中国的多数地区进入了“诉讼社会”的运转轨道,而乡土社会正是“诉讼社会”最真实的写照。参见[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10] 朱文慧:《现实与观念:南宋社会“民风好讼”现象再认识》,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徽宗“崇宁元年，户二千二十六万四千三百七，口四千五百三十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四”，南渡后，据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的统计数据，“两浙、两淮、江东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广东、广西十五路……有户一千二百六十六万九千六百八十四”^[1]，虽然隋唐疆域广阔，但在户口数量层面要远逊色于宋代。

然而，由此产生的问题亦不得不令我们给予必要的关注，那就是地力（利）、物力（利）在人力面前已然捉襟见肘，有限的自然资源在无限的人口繁衍生存面前已然入不敷出，庞大的人口基数与愈加限缩的国土面积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因抢占资源、厚产丰贲而产生的恶风薄俗、引发的民间争讼也就随之而来了，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2]。

表1 《宋史·地理志》所见宋代社会风俗

篇目	路级行政区划	社会风俗
《宋史·地理志一》	开封府、京东路	“其俗重礼义，勤耕织……登、莱、高密负海之北，楚商兼凑，民性愎戾而好讼斗。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然专经之士为多”
	京西南路、京西北路	“洛邑为天地之中，民性安舒，而多衣冠旧族……盟津、荥阳、滑台、宛丘、汝阴、颍川、临汝在二京之交，其俗颇同”
《宋史·地理志二》	河北路	“人性质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犄。土平而近边，习尚战斗”
	河东路	“人刚悍而朴直，勤农织之事业，寡桑柘而富麻苧。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嗇尤甚”
《宋史·地理志三》	陕西路	“民慕农桑，好稼穡。鄂、杜、南山……大抵夸尚气势，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蒲、解本隶河东，故其俗颇纯厚。被边之地，以鞍马、射猎为事，其人劲悍而质木……上洛多淫祀，申以科禁，故其俗稍变”
《宋史·地理志四》	两浙路	“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
	淮南东路、淮南西路	“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人性轻扬，善商贾，廛里饶富，多高贲之家……其俗与京东、西略同”
	江南东路、江南西路	“人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然”
	荆湖南路、荆湖北路	“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概种，率致富饶，自是好讼者亦多矣。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淫祀”
《宋史·地理志五》	福建路	“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浸贵，故多田讼。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两浙略同”
	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	“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视医药，及亲在多别籍异财。汉中、巴东，俗尚颇同”
《宋史·地理志六》	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民性轻悍……民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

从上表可知，南方地区的争讼现象相较于北方地区更为突出，东部地区的争讼现象相较于西部地区更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经济发展与民间争讼之间的因果关系，荆湖南路民人“率致富饶，自是好讼者亦多矣”就是微观例证。其中，京东路登州、莱州、密州因近拥海盐水产之利，农织凋敝而商业发达，故其民养成了重利轻义、喜于以兴讼作为嗜利手段的性格，这与该路“朴鲁纯直”、敦尚礼仪的民风大相径庭，因而可以认定为其是仅限于特定区域内的个别现象。两浙路“急图利”的社会风习是本地区封建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必然结果，加之在地少人盛、资源富庶之自然形态的影响下，该路民众“奢靡”的习性由此得以展现，虽然《宋史·地理志》中并未提及民多争讼，但推断出该结论似也并不困难。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的民间健讼风潮在宋人的文集与笔记小说中皆有所反映，东路의歙州（徽州）与饶州、西路的吉州就是典型代表。福建路地狭民夥的人地矛盾尤为凸显，在“亩直浸贵”的推

动诱导下，以争田业、争界至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田讼”自然也就无法避免了，这是该路民间争讼的主流面向与集中体现。因与江南西路袁州、吉州相接壤，荆湖南路亦没有摆脱阖境好讼之习的束缚。与此同时，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等区域出现了与上述争讼频仍之地不一致的景象，民间争讼非但没有达到“无日无之”的境地，反而有所衰少，“民性安舒”的京西南北路就是典型。然而应当承认的是，《宋史·地理志》立足宏观、聚焦路级行政区划，虽然可以使我们总结归纳宋代民间争讼的地域性规律，但难以管窥各府、州、军、监的民风社习，对此，笔者将参照《方輿胜览》作进一步的分析。

[1] [元]脱脱：《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93-2096页。
[2] [元]脱脱：《宋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12-2248页。

（二）《方輿胜览》：南宋社会风俗的微观考察

南宋建宁府建阳人祝穆编撰的《方輿胜览》主要记载了南宋行在所临安府、浙西路、浙东路、江东路、江西路等十七路所属的府、州、军、监之郡名、风俗、形胜、土产、山川、学馆、堂院、亭台、楼阁、轩榭、馆驿、桥梁、寺观、祠墓、古迹、名官、人物、题咏

等，内容既丰富又全面，是了解南宋时期各地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的知识宝库。虽然这其中可能参杂了祝穆个人的情感喜好，但其真实性、客观性应是毋庸置疑的。换言之，如要对南宋社会风俗进行微观层面的考察，《方輿胜览》不失为一部可资详究的地理志文献。为了条理清晰地叙事说明，仍以表格的形式将本书记载的民间风俗汇集如下，见表2所示。^[1]

表2 《方輿胜览》所见南宋社会风俗

路级行政区划	州级行政区划	社会风俗
两浙路	临安府	“其俗轻扬”“俗尚侈靡”
	平江府	“骄奢好侈”“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故多奢少俭”
	镇江府	“人性骄奢”
	嘉兴府	“风俗淳秀”“慕文勤农”
	安吉州	“奢靡而亡积聚，寡求而不争”
	常州	“人性吉直，异材挺生”
	建德府	“俗号辑睦”
	江阴军	“人秀而文”，所辖属县“民醇事简”，可堪称两浙路“真乐土”
浙东路	绍兴府	“民性敏柔而慧”
	庆元府	虽然“尚礼淳龙”，但“民讼繁伙”“民剽多盗”
	衢州	“俗悍以果，君子尚气敏于事，多亢言而厉行”
	婺州	“俗勤耕织，名士辈出，士知所学”
	台州	“閭閻兴礼逊”
	瑞安府	“俗少争讼”
	处州	“家习儒业，赋输素办”
福建路	福州	“民俗纾缓”“四民皆溢”
	邵武军	“人性犷直，儒雅之俗”
	建宁府	“尚侈而好浮，尚业而喜节”，在此风俗渲染下，“君子勇于为善，小人敢于为恶”
	南剑州	“民俭啬而尚气质”
	泉州	“风俗淳厚，名贤生长，民淳讼简，其人乐善”
	兴化军	“秀民特多，比屋业儒”
	漳州	“其民务本，俗故穷陋”
	汀州	“民生尚武”
江东路	建康府	“衣冠萃止，艺文儒术为盛”
	太平州	“民安俗阜”
	宁国府	“民安俗阜，清凉高爽”“乃风俗和柔之境”
	徽州	“人性刚而喜斗，君子则务为高行奇节”
	池州	“民醇气和”
	南康军	“以兴教善俗为务，揖先儒淳固恣实之余风”
	信州	“文风日盛”
	饶州	“民不迫遽，其人喜儒，荐土德兴为最，有陶唐之遗风”
	广德军	“民醇事简”
江西路	隆兴府	“人杰地灵，人好经学，人尚黄老”
	袁州	“细民险而健，薄义而喜争”
	赣州	“嗜勇好斗，仇健难治”以致“多逋荡奸欺之讼”
	吉州	“郡多秀民，儒术为盛”

[1]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5-595页。

续表

路级行政区划	州级行政区划	社会风俗
江西路	瑞州	“土秀而文，其细民险而健，其吏民朴野”
	抚州	“其民乐于耕桑，其俗风流儒雅，乐读书而好文词”
	建昌军	“其民气刚而才武，比屋弦诵”
	临江军	“尚礼教而畏清，勤力而知分”
	江州	“习知武事”
	兴国军	“郡小民醇，囹圄昼闭”
	南安军	“儒术之富”
湖南路	潭州	“其人劲悍决烈”
	衡州	“人多纯朴”
	道州	“俗尚韶歌”
	郴州	“民俗愿朴，风俗脆薄”
	永州	“参百粤之俗，其人鬼且机”
	宝庆府	“其人尚气而贵信” “喜直而恶欺，节俭而不奢朴，直而不挑”
	全州	“风俗俭陋，民讼甚简”
	桂阳军	“淳朴近古”
	武冈军	“风俗俭陋，狱讼亦简”
	茶陵军	“颇有蛮风，尚勇好斗”
湖北路	江陵府	“蛮荆之地，五方杂居”
	汉阳军	“美化行江汉”
	鄂州	“人多劲悍”
	寿昌军	“土地瘠确”
	岳州	“人性悍直”
	陕州	“民俗俭陋，业儒者鲜”
	荆门军	“冠盖旁午”
	常德府	“人气和柔，信鬼而好巫” “多淳孝，少宦情，以黄老自乐，有虞夏之遗风”
	澧州	“有屈原之遗风” “风俗夷獠”
	辰州	“夷獠杂居” “颇杂徭俗”
	沅州	“颇与巴渝同俗” “俗好巫鬼” “虽蛮俗之杂居，地僻人稀，亦土风之素朴”
	靖州	“土风不恶，民俗亦醇”
	德安府	“其土风醇厚，其土多秀杰，俗喜儒学”
	复州	“多杂蛮俗” “人性淳和风俗之美”
	信阳军	“申伯遗俗”
京西路	襄阳府	“其民尚文，俗尚豪侈……杂难理”
	随州	“其地僻绝，其俗醇厚，庠贫薄陋，常有贤者”
	枣阳军	“佳气郁葱”
	郢州	“民俗朴俭”
	均州	“俗好楚歌，民多秦音，公庭无事，民人朴野”
	房州	“有蛮夷之风，兼秦楚之俗”
	光化军	“其俗朴陋”
广东路	广州	“质直尚信” “俗杂五方”
	肇庆府	“土旷民情” “夷獠杂居”
	德庆府	“夷獠相杂”
	封州	“其民知义，民淳讼简”
	英德府	“颇同中夏，俗乐商贩”
	韶州	“其民短力弱材，习朴而不杂”
	潮州	土人 “笃于文行延及齐民”
	梅州	“土旷民情，其俗信巫尚鬼”
	惠州	“以东坡重，文物不下他州”
	循州	“为最饶富，资奉易足”
	连州	“风俗醇厚……地大民众，商贾阜通”

续表

路级行政区划	州级行政区划	社会风俗
广东路	南雄州	“俗杂夷夏”
	南恩州	“夷獠杂居”
	新州	“俗以鸡卜，民薄产而多贪”
广西路	静江府	“俗比华风” “土之秀美岂乏人”
	柳州	“古为南夷，风俗与全永不相远，风气与中州不甚异”
	郁林州	“俗反淳古，力田务本，好学者多”
	横州	“地隘民瘠，俗惟种田”
	邕州	“椎髻箕踞，鼻饮之俗” “人性轻悍”
	廉州	“青草黄茅瘴，土少耕稼”
	象州	“俗好淫祀，人多聘猎” “郡少秀民”
	浔州	“民淳讼简”
	藤州	“俗不知岁”
	梧州	“质直尚信，乐音闲美”
	贵州	“土风尚朴，人性轻悍，民力耕为业……以富为雄，夷獠杂处”
	昭州	“风俗视沅湘伯仲，决科入仕不乏”
	融州	“民獠杂居”
	宾州	“民醇事简” “讼稀物廉俗阜”
	庆远府	“人风犷戾”
	贺州	“俗重鸡卜” “土知为学”
	化州	“其俗信鬼，无复文身断发”
	高州	“民尚简俭，祭鬼祈福”
	容州	“人性刚悍，不习文学……礼度同中州”
	钦州	“多逐末之民” “罕业儒之士”
	雷州	“风俗颇淳，实杂黎俗，居民富实”
海外四州	琼州	“其俗朴野”
	吉阳军	“地狭民稀，多阴阳拘忌，水土无他恶，地僻无书”
	昌化军	“民服单被，数百家之聚”
	万安军	“其俗质野，信尚巫鬼”
淮东路	扬州	“江南之气躁劲，土俗轻扬，朴而不争，富庶甲天下，俗喜商贾”
	真州	“其俗躁劲，市井荒陋”
	通州	“其民苦窳而贫，讼庭多虚，仕宦之乐土”
	泰州	“性多朴野，俗务儒雅”
	淮安军	“其俗劲悍轻剽，土任气节，战争诈伪”
	宝应州	俗“与淮安军同”
	高邮军	“俗厚而勤稼，好谈儒学”
	滁州	“风俗淳厚，地僻事简，年丰事少……贤士君子居焉”
	招信军	“尊儒慕学，东南之秀，东鲁之遗风”
淮西路	庐州	“人性躁劲……酷信淫祠，鬻讼好争”
	无为军	“习于干戈，风气果决，颇务农桑”
	安丰军	“人习战争，文辞巧而少信”
	濠州	“性率真直，文词并兴”
	和州	“取协和之义，男夫尚垦辟，无游人异物以迁其志”
	安庆府	“人性躁劲，风土清美，率性真直”
	蕲州	“淳龙近古，秀民乐于为儒”
	黄州	“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土朴而不陋”
	光州	“人性躁劲，俗好俭约，俗美民淳，地雄物伙，士尚名教”
成都府路	成都府	“民性循柔，其俗好文，学者比齐鲁”
	崇庆府	“轻易褊阨，尚侈好文，俗好歌舞”
	简州	“有邹鲁风……人多工巧，郡治之古”
	嘉定府	“地灵人秀，人士俊义”

续表

路级行政区划	州级行政区划	社会风俗
成都府路	眉州	“俗近古者三（即‘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礼教，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笔者按），学者独盛，以诗书为业，以名节相尚”
	隆州	“有古淳质之风，地左俗朴……家贫而好学，颇慕文学”
	彭州	“其人敏惠，士多英才”
	汉州	“人士俊义，士为师帅”
	锦州	“文而不华，人饶地腴”
	雅州	“地多岚瘴，黎风雅雨，皇佑始有登科者”
	茂州	“诗书之训阙如，耕作者多，号为难理”
	永康军	“其俗刚悍，颇杂夷风，民知力耕”
	威州	“工习射猎，尤劲悍性”
	邛州	“其人敏慧，郡多富人，夷獠相杂”
	黎州	“常多风，岚雾常晦”
	石泉军	“习尚静约，不萌侈心”
夔州路	夔州	“其人豪，人多劲勇”
	归州	“郡少农桑”“夷夏相半”
	云安军	“风俗淳厚”
	大宁监	“最为褊陋，轩冕者寡……藉商贾以为国”
	开州	“俗重田神，绩文相高，唱竹枝歌”
	达州	“任侠尚气，质朴无文，俗不耕桑”
	万州	“风俗朴野，尚鬼信巫”
	梁山军	“阅旬无讼”
	施州	“地杂夷落，犹近华风”
	绍庆府	“巴渝同俗……蛮獠杂混，号为难治”
	重庆府	“刚悍生其方，善歌舞”“有易扰难安之俗，多欺孤负弱之奸”
	南平军	“风俗朴野，化为中华，鬼信巫”
	涪州	“人多戇勇，刀耕火种，俗有夏巴蛮夷”
	咸淳府	“士颇尚气，守节不屈”
	珍州	“其俗夷獠，其民以耕殖为业”
	思州	“蛮獠杂居”
潼川府路	泸州	“朴野少儒学”
	潼川府	“俗好胜尚气，士通经学古，人杰地灵”
	遂宁府	“民醇有古风，人物富繁”
	顺庆府	“其民喜商贾，人才之盛”
	资州	“地狭民贫，为多土国，词客才士未尝一至，夷汉杂居”
	普州	“地僻俗固……俗为近古，士多于民”
	合州	“土风朴厚，人多秀异”
	绍熙府	“有简俭风，其人敬慧，蛮獠杂处”
	昌州	“其俗朴厚，民勤而力穡，士愿而劝学，尊道而重儒”
	渠州	“其人勇健，人才盛于汉”
	叙州	“朴而易治，士静而文，夷夏杂居”
	淮安军	“土瘠民稚，士务力学”
	广安军	“賁人剽勇，人物间出”
	长宁军	“地多瘴疫……声教所渐”
	富顺监	“俗恣而愿，俗知礼逊，仍有夷风，士竞于文”
利州东路	兴元府	“其气强梁，其民质直，多事畋渔，秦资其富”
	利州	“土瘠民贫，民贫役重，壤错羌氏，杂以秦语”
	隆庆府	“人性谦和，世有俊彦”
	剑门关	“直行申发文字，货殖所萃”
	阆州	“地暖气清，地僻人富，地险人豪，恭俭而文，民淳事简，锐气喜舞，刚悍生其方，人才之盛”
	蓬州	“其民纯朴，少商多儒，务农力作”

续表

路级行政区划	州级行政区划	社会风俗
利州东路	巴州	“地僻民淳，地大俗阜，安于简俭，乐于歌舞”
	金州	“深有楚风，词讼绝少，俗重寒食”
	洋州	“好气勇斗，信鬼不信医，健讼少文艺”
	大安军	“纯朴好勇，务农习猎”
利州西路	沔州	“人性质直，务农习猎，连杂羌”
	天水军	“人性质直，以射猎为生，以材力为官，尚气概先勇力”
	凤州	“质直好义，有郇风之余”
	西和州	“其俗悍劲，地瘠少田”
	同庆府	“其民以耕织为生，以射猎为先”
	文州	“俗同秦陇，无可耕之野”
	龙州	“性多质直，务农工猎”
	阶州	“性多质直，地杂羌氏，文王理化，务农习猎”

“治道之要在正风俗，而风俗之别则有二焉，曰民俗，曰士俗。民俗不正，士俗救之”^{〔1〕}，为了使乡民“平日群居之所从事，不过为觅举谋利计”^{〔2〕}“见利忘义，苟求妄取，兼并争夺，放僻邪侈，无所不为”^{〔3〕}的风俗消隐遁形，迎来“人伦归厚，风俗还淳”^{〔4〕}的新社会风向，基层官员们每每赴任，皆会秉持“风以动之，教以化之”^{〔5〕}的治理理念，以劝谕文的形式导民向善。如知福州蔡襄面对本地乡民“听妇言，贪财利，绝同胞之恩、友爱之情”以至于“兴诉讼，冒刑狱，至死而不息”的好讼习性，发布了《福州五戒文》，劝谕其应“为子孙之计则亦久远，居乡党之间则为良善。其议至明，不可不知”^{〔6〕}；知泉州后又以“夙夜悉心，唯民实忧”的心态发布了《谕乡老诸生文》，在文中鼓励乡民进入州郡官学以形成“治经术、习文章、讲道义”的道德品质，最终迎来“一家修之，一国效之，能以兴礼让而止狱讼”^{〔7〕}的理想社会秩序。张栻知静江军时访寻本军“风俗不美事件”，后作《谕俗文》

一篇，以劝告乡民在“反复思念，递相告谕”的基础上“共行遵依，以善风俗”^{〔8〕}。真德秀曾知泉州、潭州、福州等，《泉州科举谕士文》《泉州劝农文》《潭州谕俗文》《福州谕俗文》等皆是其美俗化民路径上光彩夺目的华章。“风俗淳厚，狱讼稀少”^{〔9〕}，风俗与狱讼之间所呈现出的反比例关系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无讼社会期许正是基层官员们在“礼治秩序由贵族走向平民”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一道德、同风俗”^{〔10〕}之社会价值共同体的思想根源，这也意味着通过考察民间风俗的善恶来探寻争讼现象的盛衰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笔者不吝精力与笔墨对民间风俗予以详究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同时，在将基层官府社会治理语境中的争讼形态与区域地理、社会风俗场域中的争讼形态两相对照后，其中的差异与错位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反思。

其一，对阖境好讼认识的差异。仅就江南西路、福建路与荆湖南路的民间风俗与争讼现象而言，非但整体划一，反而有所参差，这三路并未形成基层官员

〔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三》，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61页。

〔2〕〔宋〕张栻：《张栻集》南轩先生文集卷九《郴州学记》，邓洪波校点，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64页。

〔3〕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十编十一《琴堂谕俗编》，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

〔4〕同上注，第73页。

〔5〕〔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五《语录下》，锺哲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533页。

〔6〕〔宋〕蔡襄，〔明〕徐勣等编：《蔡襄集》卷三四《福州五戒文》，吴以宁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18页。

〔7〕同上注，第619页。

〔8〕〔宋〕张栻：《张栻集》南轩先生文集卷一五《谕俗文》，邓洪波校点，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32页。

〔9〕〔宋〕苏辙：《栞城集》卷二六《陈述古舍人辞庙文二首》，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49页。

〔10〕陈景良：《法律史视野下的唐宋社会变革——从“皇权统治国家，士绅构建社会”说起》，载《公民与法（法学版）》2012年第2期。

们所认为的阖境好讼风尚，江西路的抚州、临江军、兴国军，福建路的兴化军、漳州，湖南路的全州、衡州、武冈军就是“俗少争讼”“囹圄昼闭”。其二，吉州、台州、隆兴府、泉州、福州等地区民间争讼现象的错位。在奔波于社会治理一线的基层官员们看来，上述地区民风好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在相关的地理志中，其非但毫无争讼之习与健讼之气，反而重儒业、重农本、多秀士、风俗醇美。其三，对宋王朝统治地域内民间争讼“无日无之”的偏离。《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见形式纷繁的讼端诉柄以及宋人的文集与笔记小说所阐发的好讼健讼现象从量化层面印证了民间争讼“无日无之”的合理性与恰当性，但《方輿胜览》却向我们展现了另外一重景象——虽然民间争讼之风遍及全国，偏远边陲之地亦无法避免，但民俗整体上呈现出了以农为本、以儒为重、以信为尚、以俭为高的向好态势，以两浙路江阴军、浙东路瑞安府、江东路广德军、湖北路靖州、京西路均州、广东路封州、广西路浔州、淮东路通州、淮西路黄州、成都府路石泉军、夔州路梁山军、潼川府路昌州、利州东路金州为典型代表的地区正是“风俗甚弊，狱讼烦多”^[1]现实背景下的一方净土。

（三）民间争讼表象与实质的视域张力

如何认识与理解这一差异与错位？笔者认为，一者为表象，一者为本质，表象与本质不过是因为观察事物的立场与视角不同罢了。

虽然宋代的统治阶层已经认识到“郡县天下之根本也，郡守天下之司命也”^[2]“令长之任，所以字民，百里之裁制自专，一邑之惨舒攸系”^[3]，但拥有“正印”身份的官长只有一人，这就意味着其扮演了“法官、税官和一般行政官”^[4]等多重角色，“察其土风井闾，而别其善恶强弱、贫富勤惰、冤

隐疾苦，以条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5]是当然的职责所系。正如《宋史》所载，“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掌总理郡政，宣布条教，导民以善而纠其奸慝；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其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除了“知府事一人”，还设“入则贰政，出则按县”的通判、教授、“掌裨赞郡政，总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于其长而罢行之”的签判等幕职官以及“掌议法断刑”的司法参军、“掌讼狱勘鞫之事”^[6]的司理参军等诸曹官。府下为县，置县令一人，“掌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平决狱讼，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凡户口、赋役、钱谷、振济、给纳之事皆掌之，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县衙属官为裨赞县政的县丞、“掌出纳官物、销注簿书，凡县不置丞”则“兼丞之事”的主簿、“掌阅羽弓手，戢奸禁暴。凡县不置簿”则“兼之”的县尉，若“四百户以下置簿、尉”，则“以主簿兼知县事”^[7]。虽然有官府属官协助郡守县令治理地方、理讼解纷，但在“今之仕莫难于为邑，弱者不足以有为，而健者或以病民，幸而得强弱之中，则积负困之，奸民挠之，欲兴事造业，有其志而不克成者多矣。又幸而不为积负之所困奸民之所挠，而在上者或不察，不得自展其才者亦多矣”^[8]的居官临民压力下，其缺乏面对数量繁多民间争讼的勇气，以致于在精力高度集中、精神过度紧张的情境下为民间正常化的争讼行径贴上了好讼、健讼、终讼的标签、为尚在行政事务处理能力范围内的讼案打上了繁伙纷委的烙印。既然其在意识形态中将民间争讼的饱和点限制在较低的程度，那么夸大争讼数量、鄙薄民间风俗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其看到的、听到的、感触到的也不过是民间争讼的表象而已。

对此，笔者试举两例作进一步的分析。其一，

[1]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八《与宋漕》，锺哲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28页。

[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判知府州军监》，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294页。

[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县令》，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24页。

[4]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何鹏，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5] [宋]蔡襄，（明）徐勣等编：《蔡襄集》卷二九《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阳序》，吴以宁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页。

[6] [元]脱脱：《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73-3976页。

[7] 同上注，第3977-3978页。

[8] [清]宋世荣辑：《台州丛书乙集》赤城集卷三《临海县重建县治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据《宋会要辑稿》载,嘉定五年(1212年)八月,荆湖北路转运司言:“信阳军系是极边小垒,止有信阳、罗山两邑,户口无多狱讼稀少。”^[1]次年(1213年)九月,知庐州李大东言:“本州流徙复业以后,田畴交错,讼牒纷然,曹职官止有四员,节推专签厅,知录、司理掌狱事,日不暇给。”^[2]按照《方輿胜览》,湖北路信阳军本就有“申伯遗俗”,淮西路庐州民人本就“器讼好争”,将二者进行对比似并不能说明问题,但细究起来实则不然。于太宗朝设立的转运司“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及专举刺官吏之事”^[3],作为“临按一路,寄耳目之任,专刺举之权”^[4]的监司,巡按州县纠弹“苛酷”“狡佞”“昏懦”“贪纵”^[5]的地方官员是其应然之责,这就决定了其行使公权力的客体是官而非民,因对民间争讼没有切身体悟,所以荆湖北路转运司仅从信阳军的地理位置与人口多寡这两个维度得出了该军狱讼稀少的结论。而庐州知府李大东在立足于本州经济复兴的现实境况、考虑到幕职官员少阙多之行政动能不足的具体问题之后才切实感受到了讼牒纷然给庐州合衙僚属带来的沉重压力,“照得扬州见管两县,曹职官尚有六员;本州所管三县,曹职官仅有其四”^[6]的抱怨正是其面对民间争讼的真实心声。其二,洪适在《台州添差通判厅壁记》中指出:“台州之为郡,环山枕海,壤僻民愿,牒诉简少,输调有常,平时从容,见谓无事。”^[7]包恢在《推官厅题名记》中言道:“台之为郡,东临大海,下莅五县,境土广袤,户口众多,词讼纷杂,而职繁剧,要不易为。”^[8]同样是台州地域,为何两位官员对

民间争讼现象的描述截然相反?其中原因依然是通判与推官各自的职掌有所不同而已。通判虽然掌贰郡政,有关“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但这仅仅从分权制衡的角度确立了通判对狱讼案件形式上的审查权,更何况“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9]是主要职责,其所扮演的角色正是最底层的监察机关。而在肇始于宋代的“司法职业化”趋势下,作为府州衙署曹官的推官因精于律法而成为了协助府州官长断决民讼的主要群体,甚至可以说府州官长的判决基本上是建立在州级属官的拟判之上,“这是宋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最大特色”^[10],既然如此,那么推官相较于通判在理论定谳层面定然会承担更重的压力,基于主观认知而对“词讼纷杂”颇有微词也就不可避免了。

不独如此,即使民间争讼“无日无之”,经过基层官员们行之有效切中时弊的治理,也能阻遏其继续恶化的导向而使风俗趋善、讼事衰息,宋代的史料中不乏其例。如知常州无锡县薛象先治理有方,以至于“户庭颇无壅塞,事至随手决之,颇无忤于人心。是间元少诉讼,今至于无”^[11]。虽然如前所述建州建安县“讼日数十百”,但时任汀州军事推官的方偕受命听理讼事,结果“旬月之间,至于闲静”^[12]。台州天台县令丁大容“御史以严,抚民以宽……禁戢强狡,以绝斗争。尤敏于听讼,前此投牒至以千计,今则十损七八”^[13]。“素以治行称天下”的程师孟知越州时“政尚简肃,不为苟且苛细之事”,其宽猛相济的治理模式使“千里肃

[1]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幕职官》,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16页。

[2] 同上注,第4316页。

[3] [元]脱脱:《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64页。

[4]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五《监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244页。

[5]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选举三〇《举官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825页。

[6]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幕职官》,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16-4317页。

[7] [清]宋世荣辑:《台州丛书乙集》赤城集卷二《台州添差通判厅壁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8] [清]宋世荣辑:《台州丛书乙集》赤城集卷二《推官厅题名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9] [元]脱脱:《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74页。

[10] 陈景良:《唐宋州县治理的本土经验:从宋代司法职业化的趋向说起》,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1期。

[11]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一五《与薛象先》,锺哲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26页。

[12] [宋]蔡襄, [明]徐勣等编:《蔡襄集》卷三七《光禄少卿方公神道碑》,吴以宁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71页。

[13] [清]宋世荣辑:《台州丛书乙集》赤城集卷一《静治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然，盗贼不敢发。川行途止，如即其家。狱讼衰息，风雨时至”^[1]。薛居宝任湖州武康县令伊始，即“延父老问疾苦，一以仁厚遇之”，由此“庭讼益稀”；知洋州后面对“近岁有健讼者”的社会现实，其又以“剖决精明”著称，由此“人不能欺，坐以无事”^[2]。达州“民嚣于讼”，知州李耆寿到任后“首以风教为务，崇学校，旌孝子”，“由是讼息，而民劝于善”^[3]。知平江府袁说友以“惻怛之爱，拊摩茆鰥，若乳保之于赤子”作为治民之要，于是“政成人和，庭讼稀简，郡廓廓无事”^[4]。“讼牒纷委”的嘉州亦如前所述，但知嘉州何逢以“专以爱民为心，治尚不扰”为己任，其令“立讼者于庭，俾自供”，在案情与诉由明晰之后则“晓以曲直”，如此“悔过者随遣之，不悛则惩以笞罚，讼由是简，犴狱屡空”^[5]。知雷州虞应龙“为政知所本”，其治理乡民“宽而有制，严不为暴”，由是“陶为清淳，讼是用希”^[6]。洪适知徽州时“六邑之留狱空讼，皆奏于府”，虽然“累牍充数”，但其“却批察折，随刃迎解”，由此促成了“讼狱清静，而州里宴然。庭中无复事”^[7]之善治目标的实现。

相较于基层官员们对州县争讼所作的过激反

应，《方輿胜览》辑录的宋人对讼简之地的评价以及描绘郡县公事闲逸的诗词更足以说明问题，而这恰好可以探明被官府治理视域遮挡的隐约浮现出来的民间争讼本质——福建路汀州“虽居南粤之穷陋，实有中州之雅俗。幸赋输之易集，亦狱讼之甚稀”^[8]；江西路隆兴府“故人为邑士多称，繇赋宽除狱讼平”^[9]；湖北路德安府“俗多尚朴，故讼简之亦稀；民稍力农，故与赋之仅足”^[10]；京西路郢州“土风朴陋，郡政清闲。但观政理而讼平，可谓调高而和寡”^[11]；淮西路黄州“讼牒昼稀，吏既欣于静治；戎享夜寂，民更乐于莫居”^[12]；广东路新州虽为“炎岭穷陋，新昌小郡”，但“事简讼稀”^[13]，南恩州“县古杉枫老，人居水竹间。字民无狱讼，携客有江山”^[14]；广西路郁林州“地虽僻陋，民乃朴淳”，已然达到了“宦游梅岭外，讼诉榕庭空”^[15]的无讼境界，贵州“赋少而供亿亦稀，民淳而狱讼颇简……民既力耕有斗米三钱之俗，郡无嚣讼乃人生五马之荣”^[16]，化州虽然“越居五岭之外，近临二水之间”，但已然是“农桑粗足，狱讼亦稀”的“善地”^[17]；成都府路嘉定府“公事无多厨酿美”^[18]，眉州“民俗畏公无讼事，郡斋闲似野人

[1] [宋]秦观：《淮海集笺注》淮海后集卷六《越州请立程给事祠堂状》，徐培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3页。

[2] [宋]楼钥：《楼钥集》卷九四《直秘阁知扬州薛公行状》，顾大朋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2010年版，第1656-1663页。

[3] [宋]魏了翁：《渠阳集》卷一六《知达州李君墓表》，张京华校点，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52页。

[4] [宋]范成大：《范成大集》卷三九《双瑞堂记》，辛更儒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685-686页。

[5] [宋]王十朋，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卷二五《何提刑墓志铭》，王国轩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0-1011页。

[6] [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九《赣州重修清献赵公祠堂记》，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23页。

[7] [宋]范成大：《范成大集》卷三八《舍盖堂记》，辛更儒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660页。

[8]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一三《福建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9]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一九《江西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

[10]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三一《湖北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4页。

[11]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三三《京西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页。

[12]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五〇《淮西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48页。

[13]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三七《广东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51页。

[14] 同上注，第353页。

[15]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三九《广西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

[16]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四〇《广西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页。

[17]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四一《广西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页。

[18]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五二《成都府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70页。

居”^[1]，隆州“近日簿书全简少，吏人惟趁两衙休”^[2]，黎州“地僻无参谒，民淳少讼争”^[3]，石泉军“虽为小垒，实系要冲；讼简狱稀，赋微用啬”^[4]；夔州路夔州“夔峡民淳狱讼稀，使君无事只吟诗”^[5]；潼川府路资州“讼庭可罗雀，铜印苍藓封”^[6]，昌州“讼简民淳羨小州，两衙才退似归休”^[7]；利州东路洋州“三县俗淳宜静理，两衙事简可闲眠”^[8]。

视野与立场的不同在强化民间争讼表象与实质之间张力的同时，也证明阖境好讼是一个伪命题。台州临海人陈公辅在《临海风俗记》中已然说得明白透彻：“急于进取，善于图利，本朝诸志以叙两浙之俗。然吴越之地，边控江淮闽浙六十余郡，两浙之地近亦十五郡，彼川谷异制，民生异俗，固有封壤密接，而习俗迥异者，得谓吴越两浙同是俗乎？盖彼特合四方而论其概尔。”^[9]苏辙未曾担任荆湖南路监司一职，其在《张绶湖南提刑》中所提及的该路“地远而多险，民悍而喜讼”自然不是基于其设身处地的直观感触，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提及了江南西路“有所谓业牾社者”这一教授讼学鼓励乡民兴讼的组织，但仅是耳“闻”而已，通过传言得出两路阖境好讼的结论与具体的社会现实定然是相去远矣，即便是综括言其概者，亦无法逃脱以偏概全的最终结局。更何况，《方輿胜览》对州郡风俗民情的微观聚焦形象地说明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基本道理，“俗好俭约，俗美民淳”与“嗜勇好斗，伉健难治”兼而有之、相辅相成才是

宋代民间争讼的真实图景。

四、结语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将宋代的社会变革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进行了跨越地域的横向对比，认为“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展，知识的普及……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10]。暂且不谈此论断是否有拔高宋代社会变革的价值地位之嫌，单就社会演变的基本规律来看，封建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及其引导下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的完善进步是宋代相异于前朝所拥有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也是“中古社会革新”的应然之意。同时，一部社会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劳动生产者社会身份地位变化的历史，从庄田农奴制演变为封建租佃制，从农奴演变为具有半农奴、非农奴地位的佃客，诸如此类的劳动生产者身份的转变构成了宋代经济体制与生产力发展的独特景致^[11]。在经济体制转型的时代潮流中，民间争讼数量的增加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不必为此作过多辩解，而且“讼师、讼学与民间诉讼的广为结合”^[12]明显增加了乡民兴讼好争的可能性，深受作邑之难困扰的基层官员们将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泛化为整个社会的普遍风习实则为面对州县政务所产生的沉重压力以及道德内省所带来的过度敏感^[13]，这只是民间争讼的表象，并非宋代地理志类文献中所申发的“民淳讼简”与“器讼好争”交错共生的民间争讼之实质。

[1]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五三《成都府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75页。

[2] 同上注，第477页。

[3]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五六《成都府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96页。

[4] 同上注，第497页。

[5]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五七《夔州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04页。

[6]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六三《潼川府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42页。

[7]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六四《潼川府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49页。

[8] [宋]祝穆编：《宋本方輿胜览》卷六八《利州东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80页。

[9] [清]宋世荣辑：《台州丛书乙集》赤城集卷一《临海风俗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10] 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序言，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2页。

[11]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

[12] 陈景良：《讼学与讼师：宋代司法传统的诠释》，载《中西法律传统》2001年第1期。

[13] 朱文慧：《现实与观念：南宋社会“民风好讼”现象再认识》，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